

社会主义的“中国经验”：1961年沪版 《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始末

张生

[摘要] 本文论及的1961年沪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主要注目于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社会主义“中国经验”如何总结？也是对“中国模式”书写的历史考察。1961年沪版《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编写单位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色地完成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总结性教材，为广大群众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指导。1961年沪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第二章是对刚刚过去数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与致敬，并且在章标题里，“革命”二字时代性地概括了节标题的“改造”论述。与1980年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相比，1980年蒋学模版教材的尾章是“社会主义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即1961年沪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起点。1961年的信心反转成为1980年的理想。

[关键词] 社会主义；中国经验；上海；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 张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200235

如果论及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清末民初的知识生产、新名词制造与教科书编纂等论题，学界已有杰出的研究与对话。⁸⁵但一般意义上，共和国史由于其自身研究对象的晚近性质，更多层面上，研究仍处于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等问题的对话中。因此，本文论及的1961年沪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主要注目于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社会主义“中国经验”如何总结？也是对“中国模式”书写的历史考察。⁸⁶

⁸⁵ 该研究代表性大陆学者有章清、孙江、张仲民、曹南屏、石鸥、毕苑、梁景和等，相关著作不再赘述。

⁸⁶ 近年代表性的“中国话语”的著作有“中国三部曲”，张维为：《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958 年上海政治经济学教学状况

1958 年 1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来沪调研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状况，会上，上海经济学界曾就政治经济学教学问题进行专门讨论。

姚耐谈及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任务繁多，“政治经济学任务重，只一年半的课程。有日校、夜校、专修科、训练班。去年又办了函授。校外任务重，市委训练班、部队、民主党派，常来人要给他们讲课”。雍文远提出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国化的问题，“编中国化的教材，是很重要的任务。编写中国化的教材首先碰到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问题，现在的体系与部门经济学重复。有人认为体系不改很难避免重复。不要这体系，但又没有一致意见。”蒋学模则形象地说，“现在讲到资本主义部分，同学津津有味，社会主义部分感到无味”。⁸⁷

陆定一在会上回应说，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有很多问题可以讲，如统购统销，粮食是否够吃，工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外援问题，人民内部矛盾等。但他也坦率承认，“根本问题是没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⁸⁸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泛滥，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为了帮助全党干部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纠正错误认知，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⁸⁹从 1959 年 12 月 10 日到 1960 年 2 月 9 日，毛泽东同读书小组成员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一起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⁹⁰据邓力群回忆说，由于自己口音不标准，主要由胡绳和田家英分工朗读，他负责记录。读书小组分工明确，十分认真。⁹¹在读书过程中，毛泽东相当不满意苏联教科书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论断，主要体现于：

1、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

⁸⁷ 《陆定一部长在沪召开各界座谈会记录》，A23-2-1409，上海市档案馆藏。

⁸⁸ 关于 1958 年陆定一来沪调研的详细研究，参见张生：《1958 年陆定一来沪调研与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史林》2015 年第 3 期。

⁸⁹ 石仲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龚育之、石仲泉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182 页。关于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代中国研究所亦有专门的资料汇编。

⁹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 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3 页。

⁹¹ 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党的文献》2011 年第 5 期。

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统购包销、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⁹²

2、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的收入。⁹³

3、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⁹⁴

毛泽东在完成苏联教科书的阅读之后，提出了重要的疑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⁹⁵1959年12月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北京、上海、武汉和天津等地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适应当前广大群众学习经济理论的迫切要求。

上海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与试用

接到中央安排以后，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抽调精干力量成立编写小组。编写组人员配备以经济研究所人数最多，有孙怀仁、王惟中、汪旭庄、曹麟章、童源轼、顾存伟、陈招顺、李鸿江、雍文远九人，党校有三人：陈俊明、曹衍成、夏

⁹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

⁹³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255-256页。

⁹⁴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301页。

⁹⁵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324页。

光华。复旦的蒋学模，外语学院的吕芳举，另有统计组一人，人民银行一人；工作人员三人。教材编写目的十分明确，“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特点，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创造性的发展，充分反映到教科书中。”⁹⁶

编写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对全书体系内容存在争论。

其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不要独立成为一章。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单独成为一章，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如果从经济规律的角度谈，容易与其它有关章节内容重复，该章的主要精神可以概括地在第一章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中讲。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杰出的经验，它不仅集中地表达了中国的特点，而且还带有普遍经济规律的性质。其二，关于人民公社及农业问题如何处理。编写人员均一致认为农村人民公社是我国的创举，应该在编写的教材得到充分反映，但对于人民公社和农业问题是否进行专章论述仍有所疑惑。⁹⁷

为了更好地推动教材编写工作进行。1959年12月13日，上海市委宣传部进一步从上海各高等学校和相关业务部门抽调了“政治上可靠、具有一定理论水准的党员干部，教师和学生共五十二人”集中。教科书编写人员成立中共上海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支部委员会加强领导，每周编写《情况简报》进行汇报。教科书支部书记李培南，副书记姚耐，支部委员有唐文章、林德铭、郭仁杰、韦健、范秉一、雍文远、苏绍智、戴朋。共划分七个组，哲学三个，政治经济学三个，秘书组一个。其中政治经济学第一组组长雍文远，副组长李鸿江。第二组组长戴朋，副组长蒋学模，姜川桂。第三组组长苏绍智，副组长夏光华、王志平。秘书组组长范秉一。哲学教科书编写工作分工由李培南、冯契具体负责，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工作分工由姚耐、雍文远、苏绍智具体负责。据简报称，这支队伍中具有一定哲学写作水平的13人，政治经济学10人左右。

编写工作紧锣密鼓地按步骤继续进行，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对于认真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意见，希望编写人员分章分节地深入研究苏联政治经济

⁹⁶ 《关于进一步修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初稿的规划》，B181-1-407-1，上海市档案馆藏。

⁹⁷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编写中存在争论问题的整理材料》，B181-1-407-28，上海市档案馆藏。

学教科书。全体人员听取并讨论了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宣传部石西民、陈其五的动员报告。“都感到担负编写贯彻毛泽东思想政治紧密结全中国实际的教科书”是十分光荣艰巨的任务。按当时的工作要求，全体编写同志集体整风，主要骨干人员纷纷发言，初步检查了所谓“错误思想”：

纠正了对编写教科书的神秘观点，以往认为“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是头发少的，胡子多的人干的；打破旧框框的教条主义倾向，如苏绍智说，以往认为“苏联教科书是不可变动的，对于教科书中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就从未怀疑过”。雍文远说，“总感到旧框框好，找不出新的东西说服自己来改变它；教书久了，思想有些凝固”；还分析了抱住旧框框不放的原理，如王志平说，“顾虑打破旧框框，不能建立新框框”；检讨对毛主席著作的错误认知，如蒋学模说，“把政策和理论总是分割开来，不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姜川桂说，“认为毛主席的著作容易懂，不象其他的经典著作那样深，就不去仔细地考虑和捉摸。”王克千说，“往往重视大部头著作”。⁹⁸

从1959年12月25日到29日，编写组花了九个半天时间将前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详细提纲及草稿共十五章全部讨论完毕。在讨论过程中，编写组采取骨干讨论和群众审阅相结合的办法。骨干讨论的结果尽可能送到群众中去讨论，群众在审阅和讨论的意见，除分别交给各章负责编写的同志外，又集中在骨干中进行研究。这样使教材编写进度能在编写组全体成员心中有数。工作相当认真仔细。

99

1960年1月21日，尽管文字粗糙，但总算完成了初稿，2月1日起开始重新进入讨论阶段，采取全体成员的大组讨论。在讨论前，除全体成员认真参加审阅准备意见外，并指定专人组成小组重点阅读。¹⁰⁰

沪版《政治经济学》教材初稿编写完成以后，上海交通大学与复旦大学两校

⁹⁸ 《中共上海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支部委员会编印的〈情况简报〉第1期》，B181-1-112-1，上海市档案馆藏。

⁹⁹ 《中共上海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支部委员会工作汇报》，B181-1-112-1，上海市档案馆藏。

¹⁰⁰ 《中共上海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支部委员会编印〈情况简报〉第8期》，B181-1-112-20，上海市档案馆藏。

率先在校试用“上海本”教材。两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反馈情况，上海交大的教师说：过去没有教科书，教员有困难，现在拿出来，又有新困难；主要是时间少，份量重；大学生中对三级所有、统购粮食等现实经济问题非常关心，希望在理论上找解决；交大在寒假时曾请电影导演郑君里讲“聂耳”，参加活动的人出乎意料的少，但在讲“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却很踊跃；这说明教科书有责任向学生交代清基本理论，使学生有能力举一反三地解决问题。复旦教师认为，上海本内容重复多，有的还过分具体，（内容）应压缩。

华东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互评

在迅速完成教材编写后，上海编写组参加了 1961 年 2 月至 5 月间华东局组织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评比会。参加者有上海、山东、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六省市，分五组交叉互评互学。

上海的雍文远、蒋学模、苏绍智代表上海编写组对省市的教材提出具体建议。关于教科书的体系结构方面。苏绍智说山东本在体系结构上是按历史的逻辑与理论的逻辑来安排的，但作为教科书，感到不够完整，有的章的题目不象政治经济学教材（如无产阶级专政、文化革命等）；初看条目，觉得缺少很多东西，仔细看后，谈是都谈了，但很分散。蒋学模说，浙江本关于“帝国主义必然死亡，共产主义必然在全世界胜利”，不象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有点象政治学、时事政策。雍文远说，从江西本的目录看，说明江西的同志是力图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着手，来研究经济规律，来安排体系的，这是好的。但是由于单纯考虑到方针政策一面，在体系结构上就显得割裂，基本概念交代不清，易于重复。象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第四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国民经济大跃进（第七章）等章，有无必要设章集中阐述，值得研究，象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第十章）、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第十一章）等章，感到方针政策味道重，经济范畴交代少。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运用蒋学模认为，山东本在这方面也是比较谨慎的、有分寸的。但是，某些地方由于过分谨慎，只作了一般的阐述，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有“画龙没有点睛”之感。雍文远认为，江苏本按马恩列斯经典作家排下来，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而且在农业问题上，江苏本把毛泽东

思想政治提到马恩列斯的前面去了，这样的阐述，公诸于世，是不妥当的。

对立面的批判也是教科书的必需内容，雍文远提出，有些地方在作对立面批判时口径有对，张冠李戴（把物质刺激与分配决定论混同）；在批判议会斗争。

“基数论”、消极平衡等，缺乏分析，说服力不强。苏绍智则觉得山东本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部分作为对立面批判的情况也比较突出，在阐述按劳分配等问题上提得过于明显。¹⁰¹

作为范本的沪版《政治经济学》教材

最后总结下来，大家一致认为，山东本文字流畅，生动活泼，态度鲜明，群众性语言引用得很好。浙江本文字也通顺，但有些笔调象报纸、文件的口吻。综合各方面，上海本的优点最多，可以做为范本使用：

1、体系结构安排的较全面，力图较完整地反映历史过程和注意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原理的全面阐述；2、毛泽东思想阐述得较慎重，马恩列斯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也讲的较充分析；3、在反修正主义方面较有战斗性，有批判，有阐述；4、无论从历史方法上或逻辑方法上看，一般讲各章联系较紧密，前后衔接，并有伏笔。

上海本甚至谈到，在尽可能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实行适当的国际分工和实行生产专业化协作化。¹⁰²这种思路至今日仍不过时。

但上海本也有需要提高和改进之处，江西的白永春认为上海本导言安排较好，体现了基本知识。但浙江的吴梦骊认为上海本导言太多了，它的内容要全部看完书才能懂。导言是否写，如何写法可以研究。

山东的何匡认为上海本阐述方法上存在着形而上学毛病，第一章中讲社会主义过渡性，就说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的缺点，很不妥当。社会主义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是统一不可分的，上海本第一章把这三者分成几个不同的节和目来孤立地阐述，而且先说阶段任务，后说矛盾斗争，把逻辑顺序颠倒了。文风上呆板也是上海本较大缺点，这方面要大加工。

¹⁰¹《华东地区部分党内同志对山东、浙江等省编写的五本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一些意见》，B181-1-170-130，上海市档案馆藏。

¹⁰²《政治经济学组在“横看”比较中发现的一些问题》，B181-1-170-143，上海市档案馆藏。

基于其深厚的翻译素养，何匡还说，上海本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太分散，有些地方没好好批判。上海本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污蔑马列主义这一学说为革命输出（第21页），这种说法不合乎卡德尔一书中的原意，同时这种说法在文字上也不通。”

吴梦骊提出，上海本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所起的反作用的阐述分量较多，而对生产关系变革要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要以经济基础为基础的论述不够。更重要的是，在批判修正主义方面也有问题。上海本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引用人家的话是否准确完整，值得讨论。

对于新中国刚刚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中国经验”，各组更以上海本为蓝本，提出一些值得讨论的共同性问题。关于人民公社。吴梦骊认为，上海本对人民公社从所有制发展来阐述，似乎可以。但以三面红旗的地位来要求就显得不够，何匡认为，上海本在人民公社中只讲所有制问题，其他分散在各章写，这使人们对人民公社这个新事物，对其产生、现状和发展趋势，不易得一个较系统的完整的概念。

更有趣的问题是，考虑到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章节，何匡认为，上海本专章讲有三大标准，与苏联教科书的做法类似。书中把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中国的人民公社对比讨论，容易使苏联同志发生反感。¹⁰³

对于各地教科书如何以上海本为“基础本”进行修改。何匡、邓克生、姚耐对各地教科书修改的总体原则谈了些看法。

何匡主要谈到教科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问题：“现在几本书都富于革命精神，但科学性很不够，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和阐述方法上，不少地方是从原理出发，从概念出发，从定义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从现象出发，引出规律性。”邓克生则谈了教科书要明确目的性：写书目的是要给人家一些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应首先解决，恐怕不是着重讲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共产主义社会转变，而是要使人明确向共产主义前进必须坚持哪些原则。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将来要做而现在不能做。内容都缺少“两点论”。因而科学性不强，如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时，都偏重于前者的反作用。

姚耐代表上海组回应说，“有三类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第一类问题，到底给

¹⁰³ 《政治经济学组何匡同志小组讨论上海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情况》，B181-1-170-119，上海市档案馆藏。

大学生哪些基本经济理论，如所有制、农业为基础，按劳分配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如何充分阐述。第二类问题，需要统一口径的一些关系问题，如商品生产中的“外壳论”、高速度按比例是一个规律，还是二个规律？可以百家争鸣，但在教科书只能一家之言，如有必要，也可注释，介绍几种说法。”¹⁰⁴

¹⁰⁴ 《政治经济学组开始“务虚”——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情报室关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参加活动华东局评选哲学教学产书工作的资料》，B181-1-170-136，上海市档案馆藏。

总结社会主义的“中国经验”需秉持的原则

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组按专题互相“横看”，明显体现了各地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解不同。社会主义的“中国经验”在各省市教科书里体现了较大差别。

关于高速度、大跃进的提法，山东本说：“所谓高速度，就是这种速度不仅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普通时期的发展速度，而且远远超过它的黄金时代的发展速度。”江苏本提到这个最高速度“将不是几倍，而是十几倍、甚至几百倍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

高速度与有计划、按比例是一个规律还是两个规律？江西本、福建本作为一个规律提出，福建本说是“共产主义的经济规律”。其余四本作为两个规律论述。江西、上海本明确提出“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福建本说这是共产主义规律。关于产业之间的基本比例关系。有的书把“农、轻、重”作为基本比例关系，有的把“两大部类，农、轻、重”作为基本比例关系，有的则把“两大部类，农、轻、重，积累与消费”作为基本比例关系，提法更不一致。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上，山东、浙江本说，“集体所有制带有较多或更多的旧社会残余和痕迹”。江苏、福建本认为两种公有制都带有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江苏本还说“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保留更多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

具体到自留地、家庭副业的性质和作用怎样？上海、山东本认为是“个体所有制的残余”，对集体经济的补充，上海本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庸。福建本与浙江本认为是“私有制残余”。上海本在指出集体所有制作用时，也同时指出与公有制矛盾的一面，提出要“加以适当地限制”。

关于毛泽东读书时重点提出的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的关系。六本书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毛泽东的看法。对政治教育谈得多，物质鼓励谈得较少。各书甚至都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同时还包含着资产阶级的法权残余，是一种过渡性的分配制度。如江苏本、山东本则直接了当地说，按劳分配原则“包含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包含有资产阶级法权”。

各地教科书论述中分歧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解差异，各书共同的困惑在

于：写中国特殊经验时，要不要论述它的一般意义？一般的范围又应多大？比如要不要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如果有标准，究竟应谈哪几条？是否把钢铁生产应该达到多少的具体数字也列上了？社会主义各国建设的方针应怎样提？

无论教科书编写情况优劣，各编写组都重视关于中国经验的总结，各书力图认真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际经验，把中国的经验的理解放在全书有关章节中。

各省市代表在确定以上海本为“基础本”的基础上，研究讨论了社会主义“中国经验”总结需要秉持的原则：

其一，正确阐述毛泽东思想。

在政治经济学中，是否要对毛泽东思想作集中概括？各编写组讨论后认为：毛主席确实对马列主义有重大的发展，但目前由我们来概括，时机不成熟，水平够不上。尤其是在导言中概括，讲少了不清楚，借多了要重复。对于每一章具体之处，应该深入贯彻的部分（如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可以在有关章节中阐述；对于一些应在全书贯串的指导思想（如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理），则须在导言中加以集中阐述：

- 1、在阐述时，必须联系马、恩、列、斯的一些基本原理，不能割断历史。
- 2、要突出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不能给人有“古已有之”的印象。
- 3、对毛泽东思想政治的评价，要提得确如其分。有的书几乎每一问题都提到“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这样却是把“统帅”降低到了“士兵”的地位，对于毛主席确实有重大发展的重要理论也不能不提。
- 4、必须与总结我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结合起来阐述毛泽东思想。
- 5、要防止用自己的感想、思想方法代替或阐述毛泽东思想。

其二，适当表达中国经验的适用性。

在政治经济学中总结中国经验，必须与研究对象联系起来，即联系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来总结生产关系方面的经验，而不能象党史一样，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三大法宝等。有总结经验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简单化，如...把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说得很容易，这种既不符合

事实，也不能突出我国经验。另一种是...使人有中国另外一套特殊论的印象。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共同道路，我们的创造有经验，但这是在普遍中的特殊。

对于要不要把我国经验明确提升成为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谦虚的编者认为，明确提不好，人家不中听，只要我们总结得好，能提高到理论上来分析，即使不提有普遍意义，实际上已有了。相对自信的编者认为，我国有些经验已为各国所公认的，可以明确提出有普遍意义，但在提法上要根据刘少奇同志在“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一文的精神。

其三，正确处理政治内容与经济内容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要有生气，就得讲一些政治，但由于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方面不能太发展。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来看，离开生产关系谈些政治也是可以的。政治经济学谈的政治不一定全部要结合经济。如果叙述上需要，稍微离开一些是允许的，但不能离开过多，否则就不符合经济学科的特点。¹⁰⁵

沪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出版

在经过编写、试用、比较各环节后，1961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试用本，主要编著者署名姚耐、雍文远、蒋学模、苏绍智，全书12章，20万字左右。该书至1964年3月时，已修订至第2版，第10次印刷，印数总计25万余册，可谓风行一时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后来者称颂说，“它突破了苏联教材传统的内容，充分反映了中国实际，是在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很好的一个探索。它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为主线，结合中国实际，遵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矛盾、相互作用的辩证发展轨迹，建立了中国化的新体系。内容上，在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地位、作用等方面，大大突破了旧传统，并提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后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及其矛盾的显现，已成为调整生产关系的重要突出方面，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和突破，给人耳目一

¹⁰⁵ 《政治经济学教材修改中应掌握那些原则的一些不同看法》，B181-1-170-139，上海市档案馆藏。

新的新鲜感。”¹⁰⁶1959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版《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资本主义部分）。两书在知识结构上，交相互应，共同构建了上海版本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的体系。

《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主编者之一的蒋学模此后从事教材的撰写工作，前后十数版，印行千万册，影响十数代学子。雍文远在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先后推出的《社会必要产品论》与《双重运行机制论》等著作更进一步地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正如雍文远曾说：“我们绝不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很好地实现了它的任务。它的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但我们又认为，在可能发生的错误中，将不断提高认识，获取教益，这是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¹⁰⁷

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与金融活动的重要的都市，姚耐、蒋学模、雍文远、苏绍智代表着20世纪早期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教育与研究的一代学人。做为1961年沪版《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编写单位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色地完成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总结性教材，为广大群众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指导。一般而言，教材编写属于高校份内之事。1950年代后半期的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文科类高校尚未明显分家，上海社会科学院不仅执行着繁重的社会教学任务，而且承担了重要的教材编写工作，在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引领了“中国经验”的总结。教学与研究并重，实践与理论齐飞，这对今时今日的高端智库建设也是一种启发。

结语

认真比较1961年沪版政治经济学教材与苏联教科书，沪版教科书十二章中的内容较好地回应了毛泽东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想法，针对中国实际进行了调整，但多数章节仍能在苏联教科书找到对应内容，如沪版教材中第一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章节，相当于合并了苏联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以及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两章，其他或直接对应，或顺序调整。唯独沪版教材第二章是

¹⁰⁶ 裘逸娟：《从实践求真知》，<http://www.sssa.org.cn/shxz/673218.htm>

¹⁰⁷ 《雍文远：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者》，<http://www.sssa.org.cn/shxz/673218.htm>

一个创新性的章节，内容如下：

第二章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节 没收大资本。国营经济的产生

第二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形式

第三节 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 农业合作化的必然性

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关系和党的阶级政策

三 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和形式

四 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¹⁰⁸

这一章的内容，恰恰是对刚刚过去数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与致敬，并且在章标题里，“革命”二字时代性地概括了节标题的“改造”论述。耐人寻味的是，如果再翻开改革开放后 1980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第 1 版，1961 年沪版教材中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已荡然无存，1980 年蒋版教材论述的起点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终点是“社会主义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¹⁰⁹即 1961 年沪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起点。以现代学术论著的一般编写习惯而言，开篇布局是作者的信心，结语代表着作者的目标和理想。简而言之，在沪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内容上，1961 年的信心反转成为 1980 年的理想。

在当今中国，从主体出发的论述伴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的态势汹涌而来，“中国梦”照耀下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等概念已浸浸然占领了中国社会科学论述的高地，“中国话语”的表达已然为时势所趋。但我们仍需

¹⁰⁸ 姚耐、蒋学模、雍文远、苏绍智：《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试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5 页。

¹⁰⁹ 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7 页。

要以历史的眼光去总结，什么样的中国经验是累积的！什么样的中国经验是淹没的！什么样的中国经验保留下来体现着顽强的生命力！什么样的中国经验丢弃在历史的烟尘里散发着幽暗的光茫！